

「新政治史研究的展望」 研討會紀要



**新政治史
研究的
展望**

會議時間：2009年8月26-28日
會議地點：中研院史語所704會議室

主題討論 (依姓名字號排列)

Christian Lamouroux	Hilde De Weerd
Mathieu Arnoux	Pierre Monnet
山口智哉	方震華
今泉牧子	包偉民
方誠峰	吳錚強
平田茂樹	胡 坤
余 蔚	陳雲怡
黃寬重	鄧小南
莫小斌	

與談人 (依姓名字號排列)

王汎森	王澆毅	吳雅婷	李如鈞	邢義田	林煌遠
柳立言	洪麗珠	張斐怡	張維玲	梁庚堯	陳昭揚
曾美芳	童永昌	黃繁光	楊宇勛	雷家聖	然慧巖
蔣義斌	鄭丞夏	鄭銘濤	劉靜貞	韓桂華	

本會議致備餐盒，惟因會議經費有限，與會學者提供會議論文，其他與會來賓僅提供會議摘要。謝謝您！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童永昌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古今論衡 第 21 期 2010.12

一、前言

回顧過去一世紀的中國史研究，讀者或許會對政治史曾取得的輝煌地位感嘆不已。以傳世的官方史書為基礎，大批學者投入政治事件、制度、領袖人格的研究，產生量豐質精的作品，建立了中國政治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對政治史的關懷並非中國所獨有，在西方，以上層政治為對象的歷史研究也同樣享有高度重視。隨著二十世紀中期法國年鑑學派的倡議，過往的上層政治事件分析，不再能滿足史家的興趣，傳統以敘事為主的政治史被長時段的整體史取代，史家更願意採納社會科學理論分析歷史，這個新的史學研究風潮，或先或後，影響了臺灣與中國大陸兩地的歷史學研究。大學歷史系幾乎不再開設以政治史為名的課程，優秀的研究生與學者轉而投向社會史、文化史等領域，以考證、敘事為主的傳統中國政治史研究，面臨新史學的大軍壓境，似乎全面敗退。

政治史在學術領域的沉寂，並不同「政治」在人類文化活動中絕跡。無論研究者如何強調基層社會、私人生活、文化活動的重要性，也不能否認政治無所不在，視而不見顯然不應是歷史研究者的正確態度，在二十世紀後期，「政治史回歸」是西方史學的一項重要特徵，然而在臺灣與中國大陸兩地，政治史研究似乎仍欲振乏力，對舊議題、舊方法的疲憊，使學者不願涉足該領域，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研究的缺憾。

宋史學者對此情況恐怕更感焦慮。宋代政治史研究經過數代研究者一百多年的累積，無論就制度、人物以及事件分析，俱有豐碩的成績，然而二十世紀末至今，新的政治史研究成果相較其他領域，卻有逐步下滑的趨勢。在臺灣，政治史已不再是研究所學生熱門的課題，每年的期刊論文亦鮮有涉及；在大陸，雖然數量仍豐，但品質卻有原地踏步之憂。有鑒於此，根據多位國際宋史學者的共識，於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以及國立中興大學主辦，在中央研究院召開「新政治史研究的展望研討會」，邀集兩岸、日本、歐、美各地的學者，共同討論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可能發展。會中將十七位發表文章的學者分為五組，在主題討論前先由各組召開分組會議，彼此交流意見。會議發表的作品，多非嚴格的學術論文，主辦人在大會開幕時即已聲明，會議並不尋求立即的論文成果，而在提供不同國籍與世代的學者長期交流、思辨的平臺，穩健鋪陳，最終完成有指標意義的重要作品。

二、政治史未來的研究範圍趨向

寺地遵，早在一九八〇年代已指出宋代政治史偏重北宋、強調靜態分析的缺憾；由包偉民、鄧小南等人主持的二十世紀宋代制度史總結與檢討，也清楚點出這些不足。鄧小南在二十一世紀初提倡「活的制度史」，並且領導相關的研究計畫，便是這些檢討的重要迴響。不過制度史畢竟不能涵括整個政治史，與會學者在肯定目前的研究成果之餘，也試圖尋求新的研究方向。

黃寬重（史語所）〈從「活的制度史」到「新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趨向〉，檢討了兩岸二十世紀政治史研究的興衰與不足，並且提出未來研究的可能，包括由政治運作的角度，整合不同領域（交通史、經濟史……）的研究成果；關注有利於展現政治意識的議題；重視政治文化以及政治概念的文化闡釋；注意理念與制度的實踐，以及學術與政治議題的結合；最後則是政治力與社會力的交會。

魏希德（Hilde De Weerd，英國牛津大學）〈新政治史：傳承與展望〉，回顧了美國宋史學界二十世紀的研究成果，指出其趨勢是由傳統強調領袖與制度的敘述史，轉向計量分析，再變為社會史視野，最後則是文化史取徑。他也指出目前的幾個新的趨勢，包括政治話語的分析，以及政治知識的溝通傳遞。後者與鄧小南主持的信息渠道頗有相關，不過作者更注意政治知識的閱讀與使用。

平田茂樹（日本大阪市立大學）〈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之新可能性——與國家史、國制史研究的嘗試性對話〉，回顧了日本的宋史研究，指出宏觀論述受到內藤湖南、宮崎市定「唐宋變革論」的過度影響，對政治結構的認識難有突破。他的建議有三：首先是跳脫以往唐宋變革論的架構，以細膩的微觀研究，包括政治過程與空間，建立起對「政治體系」的再認識；其二是深化分析政治事件與政治集團，不流於簡單的印象；其三則是納入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視野，致力於政治文化的研究。

包偉民（中國人民大學）〈「地方政治史」研究雜想〉，指出過去研究地方政治，忽略了區域差異，並且每每以非制度化解釋地方政治的失序，實則政治運作必有其合理。他建議學者更重視由下而上的研究視角，以及地方社會的多樣性，且特別注意慣例與習俗。作者也呼籲擴大史料的運用，並且警覺宋代雕版印刷盛行後，大量出版資料造成史家對某種現象的過高估計。作者最後也批評了當前社會科學理論掛帥的問題，希望能回歸史料，建立起符合歷史實情的架構。

鄧小南（北京大學）〈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發」〉，清楚闡釋了當前新政治史研究的基本理念。新政治史是對歷史的「再認識」，透過新研究取徑如社會史與文化史，關注過去的研究主體，從而衍生如過程、儀式、政治文化的研究，以及對於「日常」

政治的觀察，藉此全面理解政治的體系。這與平田茂樹的主張相呼應，然而過程論應當是重建政治結構的「過程」，而非研究的最終目的，否則即會落入另一種僵固的政治史研究。作者也呼籲宋史學界擴大合作與交流。

三、針對較明確的議題，提出研究的可能

除了勾勒政治史未來的研究大範圍趨向，學者也針對較為明確的議題，提出研究的可能。方誠峰（北京清華大學）〈北宋後期政治史研究的問題與反思〉將焦點置於北宋後期的政治史。他指出過去對於哲宗、徽宗兩朝的研究，往往過於強調黨爭、君主專制，並使結論流於某種必然論。他建議由歷史人物自身角度出發，注意他們是基於何種的時代認知，從事建置與決策。

山口智哉（中興大學）〈從儀禮的角度來分析宋代政治——有關科舉的儀禮為中心〉，試圖分析政治儀禮（事實上是「禮儀」）的意義，並且以科舉禮儀與鄉飲酒禮為例，說明禮儀在強化君主形象、建立士人認同，以及呈現地方秩序的作用。作者的目的在透過禮儀研究，開啓政治史的新領域。與會學者則指出科舉禮儀中的敘同年，與朝廷的反朋黨態度顯有衝突，期待作者進一步的討論。

余蔚（復旦大學）〈分部巡歷：宋代監司履職的時空特徵研究〉是制度史強調過程與細節研究的範例。作者關注監司「巡歷」的職責，仔細分疏了監司巡歷的制度與現實。認為宋代監司身兼行政與監察的職責，巡歷範圍雖較漢代刺史小，但負擔卻更大，國家也會根據實際需要，調整巡歷週期或範圍。

吳錚強（浙江大學）〈分析的政治史〉，建議以政治主體為研究焦點，首先界定不同主體的利益、價值、目標與手段，將其置入某個主題，分析各主體間的政治運作與博弈，從而形成了什麼政治秩序。作者近年關注的焦點是科舉理學化的問題，希望藉由主體分析，重新認識宋代複雜的政治社會實況，這種看重歷史主體本身的取徑，與方誠峰有類似之處。

今泉牧子（日本上智大學）〈關於縣級地方行政研究的可能性〉，著眼於國家權力的最底層與百姓的互動，分析了縣令的兩種類型：中央志向型與土著型。作者認為今後對於縣的研究可以注意縣成立所依賴的體系、中央與縣的文書行政，以及中央政策如何藉縣實行。

陳雯怡（史語所）〈元代去思碑的政治意涵〉，試圖藉地方懷念官員的「去思碑」，闡釋箇中的政治文化意涵。這包括碑文反映的「循吏」條件；去思碑設立牽涉的各種人物、組織及其互動；以及「碑」的形式如何在士人往來中發揮作用。作者也指出，

微觀研究的最終目的，是希望理解士人在蒙元政權下的各種文化表現，作者長期關注士人社會，她的報告也顯示政治史與社會史乃至文化史的交融。

方震華（臺灣大學）〈跨斷代視野的政治史〉，以跨斷代作為研究取徑。作者以「政治典範」為例，說明唐宋跨斷代研究的可能。治國典範較易有延續性，但在不同時代又會產生不同的辯論，藉此可以呈現時代的特殊政治背景。作者也提供了重農、化民與對外關係三個可行的議題。

歸納學者所提出的研究方法或議題，有幾個傾向，首先是跨領域、跨斷代的對話。黃寬重、鄧小南都已經指出，一個社會科學意義中的「政治史」門類，可能會限制學者的視野，實則「政治」包羅萬象，涉及的層面很廣，勢必要整合其他領域的研究結果。藍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法國國家科學院）〈宋代的貨幣政策：中國國家權力的再評價〉有助於理解這種看法。作者因工作環境所致，必須頻繁地與其他領域學者對話，從而藉經濟學的激盪，討論宋代貨幣與國家權力的關係。作者指出，不同於西方貨幣理論所強調，私人資本行動在貨幣發行中的地位，宋代的紙幣深具國家財政工具的色彩。這一方面統合了政治與經濟兩個領域的歷史，另一方面也有助於避免社會科學理論的誤導。

四、歐洲學者：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對照

會議的另一重點是兩位歐洲中世紀史家的報告。Pierre Monnet（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新主題、新途徑：二十一世紀政治史的發展〉，為宋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對照。作者的討論集中於法、德兩國的中世紀史研究，並且特別關心「政治」在中世紀的意義。作者指出中世紀的政治主體相當多元，不僅限於國家或中央；協商與尋求合意是當時政治運作的特色，儀式、象徵、巡視、宣誓等都構成了當時的政治圖像。作者也強調了平民的政治參與問題，這些課題對於中國史研究者而言都有相當啟發。

Mathieu Arnoux（法國巴黎第七大學）〈天堂與暴亂之間：三級會議中的人民〉，也是針對歐洲中世紀史的研究。作者簡述了法、英封建社會三級會議的研究歷程，指出三級會議是統治工具，也是協商工具，有助於解決當時因農民暴動引起的社會動亂，對於界定個人自由和農人的地位具備關鍵作用。這對於中國史學者頗有啟發，毛傳慧（清華大學）便指出，中國史對於平民的政治參與問題，仍缺乏深入的關照。

這種跨國界的對比應當頗有助益，如果注意到法國二十世紀後期政治史的回歸，東方學者或許不致有孤寂之感。張廣達（臺灣大學）回顧了法國二十世紀後期對於政治史的回歸，指出法國學界對於早期年鑑學派忽略政治史的態度，頗有反省，如年鑑

學派第三代對法國大革命中政治人物動機、理想的研究，便與布勞岱爾強調的結構論有所不同。新的研究取徑、問題意識叢出，在二十世紀後二十年，也產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作者也呼籲學者要更注意中外學者的合作，魏希德則指出，這種跨國際的交流與刺激，是二十一世紀學界的重要特色，過往以民族國家為分際的壁壘分明，應當重新考慮。

五、研究者與研究主體的關係

與會的學者也注意到研究者與研究主體的關係。黃寬重分析自己對於宋代歸正人、害韓殺岳、地方武力等問題的研究，往往出自對現實政治的迴響，或者偶然的跨領域閱讀。藍克利也注意到，歐洲近年對政治史的研究，其實也與歐盟的成立密切相關，學者有感於當代政治的變革，從而回頭注意歷史上的政治變化。然而這種研究者對於自身研究理路的剖析，似乎不能僅停留於私下的抒懷，冀小斌（美國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把史家放到歷史中看：從比較的視角看宋代政治史研究〉，便提醒學者，務必意識到自身知識的脈絡，不能因為要證明研究的價值，而扭曲了研究成果。作者也指出，東西方研究的交流，除了要留意議題，也要留意兩方學者學術脈絡的來源與差異，包括東西方史料的意義差距，以及雙方知識背景的源流。作者也提到中國史學者對史料版本往往不夠用心，這也獲得黃寬重回應。受到後現代史學的影響，學者也針對文本的可信度提出質疑，從而同意歷史學有時研究的並非絕對的史實，而是事實與史家的關係。

會議成員也同意當前政治史的研究，需要參考社會史、文化史的視野。魏希德對美國宋史學界的回顧，已經指出社會史、文化史對於學者的影響。許多學者呼籲加強政治文化的研究，與西方當前新文化史的走向也頗類似。陳雯怡並且明確指出，「政治史的回歸」，並非指解釋典範的回歸，而是涵容社會史、文化史視野的結果。這一方面引致政治史核心喪失的疑慮，另一方面也有過度依循理論的問題。胡坤（北京大學）〈政治史研究的思考與體會〉也指出，當前對於政治史的檢討，諸如揚棄「王朝興衰」，強調文化史各種主題的研究，可能會使政治史失去核心；而強調許多文化意義的闡釋，也有迷失於理論的危機，他因此對目前提出的走向稍持保留。

這其實與「何謂政治」的問題息息相關。或許是認為多數人對政治一詞早有定見，大多數學者於此並未刻意留心。少部分學者則是以權力為政治史的研究核心。然而學者也質疑以無所不在的權力定義政治史，是否流於泛政治化，或者失去有效的範圍；部分學者更指出，相較於會議定名為政治史，自己的研究領域實際上屬於社會史的範疇。對此，鄧小南認為政治史的核心仍是以公部門相關的議題為主，各種外延的

研究最終不能偏離主軸；作品的屬性是作者與讀者兩方「合意」的結果，政治史並不是教條式的學科，而是針對特定課題產生的研究路徑。

另一方面，學者對於理論的引介也有熱烈討論。包偉民首先指出社會理論氾濫引起的學術風氣問題，然而正如作者所言，大部分中國學者對於西方理論都缺乏反思的能力，僅能單純選擇用或不用；藍克利則指出，研究者幾乎不可能不用理論處理課題；進一步說，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的理解，實已包含一系列的預設，諸如對資訊傳遞與統治的關係、中央政府與地方權力的互動，乃至「政治」本身便已蘊含複雜的預設。對於理論的充分理解與警覺，其實便是冀小斌所言，將史家放回歷史中，更加注意自己的觀點與預設，這也有助於學者重新界定「政治」的意義。就此而言，學者不必急於界定政治的疆界，而能以再認識「政治」本身為前提，發展新的研究。中國史學者較無抽象思辨的學術傳統，以會議成果而言，年輕學者多半聚焦具體的議題，較難觸及抽象的思辨層面，這方面似乎有待進一步努力。

六、總結

總結本次會議的成果，學者都一致同意政治史研究者需要時時警惕自身研究的不足，藉由反省提出有效的新研究取徑。從實踐而言，表現在新方法與新議題兩方面；學者一方面認為史無定法，但也認為需要根據不同的議題，廣泛搜求可行的出路，包括跨領域、跨斷代、跨國界的比較研究，以及針對政治史本身，細膩的過程分析，最終則是要取得對於政治史整體的理解，乃至對於政治本身概念的重建。「新」政治史並非與過往的研究斷裂，而是繼承與再出發，沒有問題意識需要斷然拋棄，但也決不畫地自限。社會科學理論或社會史、文化史的範式可以作為參考標的，但也僅能視之為通往目的的鑰匙，不應自滿於成為理論的註腳；一如鄧小南在總結中所言，本次會議的目的與其說是求實，不如說是「務虛」，不急於尋求成果，但希望就此建立國際性的交流，學習不同背景學者的思考方式。

本屆會議從形式與目的而言，皆為首創，雖然具體的論文並非會議焦點，但最終目的是希望激發學者對政治史研究的興趣。會議雖以新政治史為名，但主要聚焦於宋代政治史，未來則希望吸納跨斷代的政治史視野，並提出對於政治史整體的新認識，以這次會議為起步，這是二十一世紀學者共同努力的目標。